

前言

本期收錄三篇文章，依序分爲〈臺灣防衛韌性治理模式的轉型路徑與挑戰：全政府結合全社會〉、〈在臺新住民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及其對公共參與的影響：大陸配偶與東南亞新住民之比較〉與〈檢視中緬邊境政治：從贊米亞觀點分析中國在佤邦的新殖民主義〉。

〈臺灣防衛韌性治理模式的轉型路徑與挑戰〉探討防衛韌性在不同治理模式下的制度特徵與演進邏輯。透過分析北歐與波羅的海國家之實踐，歸納行動者配置與政策整合差異。研究發現波羅的海三國在高度外部威脅下，透過政府主導的跨部門整合與制度動員，展現出強烈的全政府途徑特徵；相較之下，芬蘭與瑞典則因長期累積的社會參與基礎與高度制度信任，使防衛韌性得以逐步內化爲社會日常運作的一部分，呈現較成熟的全社會途徑樣貌。兩種途徑雖在運作邏輯上有所差異，但其共同目標，皆在於確保國家與社會在面對危機時，仍能維持基本功能與政治穩定，且兩種途徑並非完全不相容。然而，我國防衛韌性建構目前仍偏向行政主導之 WoG 模式，社會層級的制度化參與尚處初步階段。而全社會防衛韌性的建構並非線性推進或單一路徑選擇，而是一個須隨威脅型態動態調整的政策過程。此一動態框架應建立在「層級化應變」與「動態優先序」的權責機制之上：由國家安全會議主導總體戰略決策，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作爲平時的跨部會協調與社會賦能平臺，而災害應變中心則爲危機發生時的具體執行節點。

〈在臺新住民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及其對公共參與的影響〉一文則討論在臺新住民的政治社會化媒介主要爲何？及其如何影響在臺新住民的公共參與。隨著跨國婚姻與人口流動的持續擴張，新住民已成爲臺灣社會結構中不可忽視的群體。如何理解並回應所在社會的公共議題，不僅關乎社會融入與文化適應，也反映多元文化社會中公民參

與的實質內涵，截至 2025 年 12 月，新住民與新二代合計人數已超過 135 萬人。這篇研究透過問卷設計蒐集資料進行分析，有效樣本共計 1,570 份，並發現：第一，在臺新住民的政治社會化媒介會根據來源母國不同而有所差異。大陸配偶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傾向使用大眾傳播媒體，東南亞新住民傾向依賴人際網絡；第二，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於公共參與的影響也會不同。家庭、同儕團體及網路均有助於提升新住民的公共參與，但是，電視媒體則比較不會促進新住民的公共參與；第三，因為不同政治社會化媒介對公共參與的影響具有差異性。家庭、同儕團體與網路等互動性媒介有助於激發新住民的公共參與，在臺灣新住民的案例，互動式的資訊傳遞機制能更有效地提升公民意識與參與意願，因而政府可考慮在宣傳新住民法規與政策的媒介選擇時以此參考以利精準宣傳，例如若能針對陸配群體加強媒體宣導與社群溝通，並同步在社群與人際網絡中進行政策釋疑，將有助於降低社會誤解，並促進政府與新住民之間的信任關係。

〈檢視中緬邊境政治〉一文則討論中緬邊境的政治結構、經濟轉型、軍事衝突等議題，同時引入以贊米亞（Zomia）概念結合新殖民主義觀點，並在豐富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的基礎上，剖析佉邦統治菁英，如何刻意維持與緬甸政治體制的差異性，並且透過禁絕鴉片、引入中國模式，形塑具正當性的治理敘事。「贊米亞」最早係由申德爾（Willem van Schendel）提出並批判以民族國家為主之地理隱喻（geographical metaphor）史觀，作者認為這個概念在緬甸係指：佉邦以靈活的策略，實現「有意的野蠻」（barbarians by design），抵抗國家體系的「捲入」（engulfment），並且審視局勢謀取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但這樣與主權國家格格不入的模式，也使他們構成了公民資格的反模型，被視為潛在的分離主義，或是外國勢力的協力者。而緬甸（佉邦）的案例，足以說明中國對外援助本質，以經濟合作的形式，贊助特定菁英派系的產業，並以「不干涉內政」為包裝，迴避監管責任。然而，中國的操作其實著重於菁英重構資本配置、獲取勞動

力的契機，並為中國輸出的「新殖民主義」模式創造容納空間。但當局勢失控時，中國迅速切割，透過打擊電詐的名義，強迫佉邦剷除電詐產業。這反映出當地統治者的權力並非來自民意，是源自新殖民主義者的支持。

《遠景基金會季刊》編輯部

